

# 中英动物词“狗”的文化语义及翻译策略研究

万乐乐, 才让旺姆\*

青海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青海 西宁

收稿日期: 2026年8月25日; 录用日期: 2026年10月16日; 发布日期: 2026年10月27日

## 摘要

动物词汇作为人类语言与文化系统的重要载体, 深刻映射出不同民族的生态经验、生存图式与价值取向。在英汉双语体系中, “狗/dog”作为与人类社会关系最为密切的动物之一, 虽具有相同的生物学属性, 但在长期的历史积淀与文化演进中, 沉淀了迥异的认知模型、情感取向与语用价值。英语文化中的“dog”多指向“忠诚、伴侣、坚韧”等正面认知图式, 而传统汉语文化中的“狗”则长期承载“卑劣、谄媚、工具性”等贬义隐喻; 同时, 在全球化与网络文化交织的当代语境中, “狗”这一词汇衍生出具有自嘲特征的新语义。本研究采用文献研究法、对比分析法与案例分析法, 以“框架错位”为分析工具, 将英汉“狗/dog”文化语义的跨语言冲突划分为完全错位、部分错位与新兴错位, 据此构建“框架错位适配模型”, 并系统探讨其在成语、俗语、文学作品及日常交际中的翻译路径。该模型表明, 文化语义差异是跨文化翻译的核心障碍, 译者需根据错位类型与文本类型, 超越字面对应, 灵活运用语义对等、功能对等、归化、异化、意象替换与释义等翻译策略, 以实现跨文化交际中的视界融合与语用等效。

## 关键词

狗/Dog, 文化语义, 隐喻, 翻译策略

## A Study on the Cultural Semantics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the English-Chinese Animal Word “Dog”

Lele Wan, Wangmu Cair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Qinghai

Received: August 25, 2026; accepted: October 16, 2026; published: October 27, 2026

\*通讯作者。

文章引用: 万乐乐, 才让旺姆. 中英动物词“狗”的文化语义及翻译策略研究[J]. 现代语言学, 2026, 14(10): 420-429.

DOI: 10.12677/ml.2026.14101010

## Abstract

Animal vocabular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human language and cultural systems, profoundly reflects the ecological experiences, survival patterns, and value orientations of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In the English-Chinese bilingual system, “dog”, as one of the animals most closely related to human society, shares the same biological attributes, but through long-term historical accumulation and cultural evolution, it has accumulated vastly different cognitive models, emotional orientations, and pragmatic values. In English culture, “dog” often points to positive cognitive patterns such as “loyalty, companionship, and resilience”, while in traditional Chinese culture, “dog” has long carried derogatory metaphors such as “baseness, flattery, and instrumentality”. Furthermore, in the contemporary context of globalization and the intertwining of internet culture, the word “dog” has developed new semantic connotations with self-deprecating characteristics. This study employs literature review, comparative analysis, and case analysis. Using “frame misalignment” as an analytical tool, it categorizes the cross-linguistic conflicts in the cultural semantics of “dog” into complete misalignment, partial misalignment, and emerging misalignment. Based on this, a “Frame Misalignment Adaptation Model” is constructed to systematically explore the translation paths in idioms, proverbs, literary works, and daily communication. The model indicates that cultural semantic differences are the core obstacle to cross-cultural translation. Translators need to consider the type of misalignment and the type of text, go beyond literal correspondence and flexibly us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such as semantic equivalence, functional equivalence, domestication, foreignization, image substitution, and interpreta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horizon fusion and pragmatic equivalence in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 Keywords

Dog, Cultural Semantics, Metaphor, Translation Strategie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语言不仅是人类交流的工具,更是文化与认知的具身载体。认知语言学认为,隐喻并非单纯的修辞装饰,而是人类理解世界、组织经验和表达抽象概念的重要认知机制。Lakoff 和 Johnson 在概念隐喻理论中指出,隐喻普遍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不仅体现于语言,也深刻影响人的思维和行动[1]。在这一理论框架下,动物词常常充当隐喻的始源域,由于其具有鲜明的文化负载特征,人类在长期生产生活实践中不断观察、利用动物,并将动物的外形、行为乃至情感经验投射到社会生活与人际关系之中,从而形成丰富的象征义、隐喻义和语用义。

“狗”是人类最早驯化的动物之一,与人类社会生活关系密切。在中英文化中,“狗/dog”都具有较高的出现频率,并广泛存在于成语、俗语、文学作品、影视作品和日常交际之中。英语国家视狗为“人类最好的朋友”(man’s best friend),其文化联想多与忠诚、勇敢、陪伴相关;而在中国传统农耕文化与封建宗法伦理背景下,“狗”虽具看家护院的实用价值,却在语言系统中一度固化出“卑劣、谄媚、奴性”等负面隐喻[2]。当译者面对含有“狗/dog”的成语、俗语、文学隐喻或日常交际语时,若仅进行机械的字面对应,往往会导致词不达意,甚至引发跨文化误解。近年来,伴随着互联网的普及和全球宠物文化的渗透,汉语网络语境中的“狗”又衍生出“单身狗”“加班狗”“舔狗”等自嘲性表达,进一步加剧了其语义的复杂性[3][4]。因此,厘清“狗”在中英文化中的语义差异并探讨其翻译策略,具有理论与现实意义。

## 2. 英汉“狗/Dog”文化语义的多维分析

### 2.1. 传统汉语文化中“狗”的文化内涵与隐喻

《现代汉语词典》将“狗”释为“人类最早驯化的家畜”，强调其动物学指称和现实功能[5]。《说文解字》中有“狗，犬也”的解释，古代还存在“大者为犬，小者为狗”的区分[6]。然而，在长期语言使用中，“狗”并不只是动物名称，而逐渐发展出丰富的文化评价意义。尽管狗在实际生活中承担着看家护院的实用功能，但在汉语的隐喻系统和修辞表达中，往往蕴含着对某种行为主体的道德品质、社会地位和人际关系的负面评价。

#### 2.1.1. 贬义隐喻的固化：“卑劣、谄媚与工具性”

汉语中含有“狗”字的成语和俗语数量庞大，但绝大多数呈现出强烈的贬义色彩。这种贬义隐喻在长期的语言使用中得以固化，主要表现为以下三个维度：

**人格的卑劣与道德的低下：**汉语中“狗喻行为卑劣、道德低下的人”是一种重要的概念隐喻模式。例如，“蝇营狗苟”（源自韩愈《送穷文》）将像苍蝇那样飞来飞去、像狗那样苟且偷生的行为，用来比喻追求私利、缺乏原则的无耻之徒，极言其人格之卑鄙。这类表达并不描写狗的真实行为，而是把文化中

对狗的某些负面想象投射到人身上，用来批判人的道德缺陷和行为卑劣。

**谄媚逢迎与依附权贵：**汉语中“走狗”“狗腿子”“狗仗人势”等表达集中体现了狗的依附性隐喻。狗对主人的顺从在汉语语境中常被阐释为缺乏独立人格与“谄媚”。例如，“狗仗人势”生动地刻画了依附权势、欺压弱小的谄媚小人形象；“狐朋狗友”则指代不务正业、因利益结合的狐群狗友，暗示其交往缺乏道义基础，仅为工具性的勾结。

**丧失庇护的落魄与低贱：**“丧家之犬”最初用于孔子的自嘲，但在后世演变中，已固化为失去依靠、无处投奔且狼狈不堪之人的代名词。在这里，“狗”的工具属性一旦脱离了主人的庇护，便直接等同于社会底层的绝对低贱与无价值。

#### 2.1.2. 农耕文明与封建宗法伦理：等级秩序下对犬类依附性的负面解读

汉语中“狗”贬义隐喻的泛化，是长时段历史中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农耕文明的生产排序与封建宗法伦理的确是核心背景，但这一过程并非均质单一，不同历史时期、不同社会阶层对狗的认知存在显著分化。

首先，从长时段历史演变来看，狗的文化地位经历了从高到低再重构的过程。先秦时期，狗是国家祭祀与贵族狩猎的重要角色，《周礼·秋官》设有“犬人”一职专门掌理犬牲，《礼记》也将“犬”列为“五牲”之一，此时狗承担公共礼仪功能，文化地位并不低。中古以后，随着精耕细作农耕文明的成熟，“牛”承载了耕田垦殖之重，“马”肩负着陆路交通与国防征战之要，二者直接维系国计民生，享有极高的宗族与国家地位；狗逐渐退居家庭护卫的次要位置，文化语义才开始逐步贬抑[7]。

其次，不同社会阶层的认知分化推动了贬义隐喻的固化。在文人士大夫阶层，儒家思想高度推崇“士可杀不可辱”的人格操守与“义以为上”的道德理性。狗对主人的无条件顺从、摇尾乞怜与见食摇尾，被儒家伦理阐释为缺乏道德自省的“奴性”与“谄媚”。因此，从汉代开始，文人写作中就逐步将“狗”固定为贬斥人格卑劣的隐喻载体。而在民间社会，狗的忠诚护主属性一直被肯定，魏晋至明清的笔记小说中留下了大量“义犬救主”“义犬报恩”的正面叙事，民间俗语“狗不嫌家贫”也一直流传，说明民间对狗的认知始终保留正面维度。

最后，近代以来的革命话语进一步强化了“狗”的贬义色彩。20 世纪反帝反封建革命中，“走狗”“狗腿子”成为指称叛徒、帮凶的常用政治语汇，这种带有强烈斗争色彩的用法进一步普及，使得“狗”

的贬义隐喻从精英阶层扩展到全社会, 最终成为现代汉语中最为凸显的语义预设。

综上, 农耕文明的生产排序为狗的边缘地位奠定了基础, 封建宗法伦理对依附人格的贬斥赋予了其道德贬义, 近代革命话语的普及最终完成了贬义隐喻的全社会固化。即使在贬义占主导的传统语境中, 民间始终保留着对狗忠诚品质的正面认知, 并非绝对的全贬义, 且这些正面意义仍以对主人的服从和效劳为核心, 其价值始终由人与犬的主从关系界定。

## 2.2. 英语文化中“Dog”的文化内涵与隐喻

与汉语传统语境相比, 英语中“dog”的正面联想更为普遍, 尤其体现在现代英美社会的日常交往和宠物文化中。狗不仅被视为人类最忠实的伴侣, 更在语言中被赋予了诸多积极的人格特质。

### 2.2.1. 褒义隐喻：幸运、勤勉与成功的象征

在西方社会, 狗被广泛接纳为“人类最好的朋友”(Man's best friend)。这一观点直接映射到英语的词汇与成语中, 使得“dog”常用于指代人, 且多含有亲昵、同情或赞赏的含义。

幸运与成功的象征: 在英语中, “dog”常与运气和地位挂钩。例如, “a lucky dog”意为“幸运儿”, 毫无贬低之意, 反而充满善意的羡慕; “top dog”指在竞争中获胜的“优胜者”“头面人物”或“掌权者”, 象征着权威与成功。

勤勉与坚韧的化身: 英语常借狗的生理特性来隐喻人类的优秀品质。“work like a dog”(拼命工作)和“dogged determination”(顽强的决心)中的“dog”, 均来自犬类在追踪猎物或执行任务时表现出的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特征, 是正面的隐喻。

同情与人文关怀: “underdog”(处于劣势的竞争者、弱者)一词反映了西方文化中对弱势群体的关注与同情; 而俗语“Help a lame dog over a stile”(助人度过难关, 字面意为“帮一只瘸狗跨过栅栏”)则将狗置于需要人类施以援手和关怀的平等地位。

英语中的“dog”可以匹配“伙伴-忠诚-坚韧-竞争地位”等多个语义框架。与汉语中较为突出的“卑微和依附”相比, 英语更容易将犬类的服从、耐力和陪伴重新解释为可靠、勤劳和忠诚。然而, 这种正面倾向仍然受到语境限制, 不能将英语中的“dog”概括为绝对褒义。

### 2.2.2. 宗教与文学渊源：狩猎文明、基督教传统中人与犬的共生伦理

英语中“dog”之褒义隐喻的泛化, 源于其独特的历史地理环境、宗教信仰以及文学创作传统的共同作用。

从生存方式来看, 盎格鲁-撒克逊人的祖先长期处于狩猎文明和畜牧文明之中。在寒冷多风的北欧森林和不列颠群岛, 狗是猎人捕获猎物、牧羊人驱赶羊群不可或缺的协作者。在这种共生关系中, 人与狗结成了同盟关系[8]。狗的勇敢、忠诚和敏锐直接关系到部落的生存, 因此, 人犬共生的伦理在英语民族的集体无意识中早早确立。

从宗教与文学创作来看, 尽管《圣经》早期受古代中东文化影响曾将狗视为不洁之物, 但在欧洲本土化进程中, 圣徒传说(如圣罗克与护卫神犬)重塑了犬类的忠贞形象。在西方文学中, 荷马史诗《奥德赛》中苦候二十载终见主人归来的老狗阿耳戈斯(Argos), 以及拜伦(Lord Byron)为爱犬波茨万(Boatswain)所立墓志铭——“具人类全部美德而无其瑕疵”, 将犬类的忠诚提升到了超越人类道德局限的崇高境界。

## 2.3. 当代汉语“狗”语义的重构与跨文化互动

语言是动态发展的社会现象。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互联网技术的普及以及社会心理的变迁, 当代汉语中“狗”的语义正不断“去贬义化”并重构出多种语义。

### 2.3.1. 当代汉语网络语境中“狗”的去贬义化与泛化

在当代的网络社交媒体中,“狗”字作为词缀的构词能力极强,产生了一大批以“~狗”为特征的新网络词汇。这些词汇在语义上呈现出明显的去贬义化、去道德化特征:

“单身狗”:指代没有恋爱对象的人。此处的“狗”剥离了传统文化中的低贱意味,转而指代一种缺乏情感归宿、孤独寂寞的生存状态。很多时候,使用者以第一人称称呼自己,如“春节又要一个人回家,单身狗太难了”,其功能更接近自我调侃和情绪分享。使用者并非完全否定自己,而是通过夸张化的自我贬低缓解现实压力,并与具有类似经历的人建立联系。

“加班狗”/“科研狗”/“高考狗”:指代面临巨大工作或学习压力、缺乏闲暇时间的人群。这里的“狗”隐喻的是一种疲惫不堪但又无可奈何的生存状态,类似于英语中的“work like a dog”。这些词语一方面带有辛苦、疲惫和被动承受的意味,另一方面也具有自我归类和群体团结的功能。比如,“打工狗”可以指称普通劳动者在高强度工作和有限选择之间的生存状态,其中既有幽默,也有对工作压力的隐性批评。因此,网络语境中的“狗”并非简单地完成了从贬义到褒义的转变,而是在贬义、亲昵、自嘲和批评之间形成了不同的含义。

“舔狗”:虽然带有一定的贬义,指代在两性关系中不顾尊严地讨好对方的人,但其批判锋芒已从传统的“道德卑劣”转向了对个体在情感关系中丧失自我主导权的调侃。

在这些网络新词中,“狗”字完成了从“道德评判词”向“状态指代词”的转变,贬义色彩大幅减弱,代之以戏谑、亲昵与自嘲[3]。

### 2.3.2. 英美犬类文化语义的现代发展与跨文化互动

英语中的“dog”同样经历了从动物名称到身份和情感符号的扩展。现代英语中常见的 dog parent、fur baby、therapy dog 等表达,反映了宠物在家庭结构中的地位变化。犬类不再只是被饲养和管理的动物,而被视为情感陪伴者和生活方式的一部分。与此同时, dog-friendly、service dog、therapy dog 等表达也说明英语社会对犬类功能的理解已从私人陪伴扩展到公共服务、心理支持和社会照护。

这一变化对汉语网络表达也产生了一定影响。汉语中的“毛孩子”“狗狗”“狗妈”“铲屎官”等表达,虽然并非都能简单追溯到英语,但它们与全球宠物文化、社交媒体传播和宠物家庭化趋势存在密切联系。

不过,英语“dog”文化对汉语的影响并不是单向输入。汉语网络词“舔狗”在英语中通常被译为 simp,而不是 licking dog;“单身狗”也常根据语境译为 single person、single and lonely 或 forever alone。这些译法表明,跨文化传播并非复制原词形式,而是通过目标语已有的文化资源重新组织语义[4]。

综上所述,传统汉语文化中的“狗”更多与“卑劣、谄媚、依附”相关联,英语文化中的“dog”更多与“忠诚、伴侣、坚韧”相关联;当代网络语境中,汉语“狗”又出现了明显的去贬义化、自嘲化。这种“同物异义”“同词异感”使“狗/dog”在跨语言转换中容易发生认知冲突。为处理这类冲突,本文引入“框架错位”作为分析工具,讨论不同文本类型中的翻译策略。

## 3. 中英“狗”翻译策略与案例解析

翻译不仅是语言转换,更是不同文化认知框架的跨语言重构。根据概念隐喻理论,动物词的文化语义本质是“人即动物”隐喻的具体映射。不同文化会形成各异的认知框架:即人们提到“狗/dog”时,会自动激活不同的情感预设、价值判断和语义联想。当源语和目的语的认知框架错位时,译者的策略选择本质就是对框架错位的修复或适配。Nida (1964) [9]的功能对等理论要求译文所激活的读者反应与源语一致;Venuti (1995) [10]归化异化讨论本质是框架重构的不同取向。结合英汉“狗/dog”的认知框架差异,我们可以将二者的框架错位明确分为三类:① 完全错位:源语激活褒义框架,目的语激活贬义框架,或

反之；② 部分错位：二者都带有相同情感倾向，但语义侧重点不同；③ 新兴错位：源语产生了传统框架之外的新语义(如当代汉语的自嘲框架)，目的语缺乏对应预设。

不同的错位类型，对应不同的翻译策略选择方式，下文结合不同文本类型具体分析，总体可分为保留框架、重构框架、补义微调、适配再造四类取向。

3.1. 习语谚语中的“狗/Dog”：从词面对应到功能对等

习语和谚语是“狗/dog”文化语义差异最集中的领域。英语中许多含有 dog 的表达已经高度习语化，若机械译为“狗”，往往会造成误解。例如 Love me, love my dog 并非“爱我，也爱我的狗”，而是“爱屋及乌”；Every dog has his day 也不能直译为“每条狗都有它的一天”，而应译为“人人都有得意时”或“风水轮流转”。在这类表达中，dog 的动物形象已经弱化，真正需要传达的是谚语背后的生活经验和价值判断，即其语用意义。

Table 1. A comparative table of semantic convers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English idioms about the animal word “dog”  
表 1. 英语动物词“狗”习语的语义转换与翻译策略对照表

| 英语表达                       | 字面语义     | 推荐译法                | 翻译策略  |
|----------------------------|----------|---------------------|-------|
| Love me, love my dog.      | 爱我，也爱我的狗 | 爱屋及乌                | 习语替换  |
| Every dog has his day.     | 每条狗都有得意日 | 人人都有得意时/风水轮流转       | 功能对等  |
| It is a dog-eat-dog world. | 狗吃狗的世界   | 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竞争残酷的世界 | 意译    |
| a dog in the manger        | 马槽里的狗    | 占着茅坑不拉屎/自己不用也不让别人用  | 文化替换  |
| dog days                   | 狗日子      | 三伏天/酷暑时节            | 释义翻译  |
| rain cats and dogs         | 下猫下狗     | 倾盆大雨                | 意译    |
| You lucky dog!             | 你这条幸运狗   | 你小子真走运/你这个幸运儿       | 口语化转译 |

如上表 1 中，dog-eat-dog 与汉语“狗咬狗”尤其容易构成“伪对应”。前者强调竞争环境残酷，例如商业竞争与职场中的“你死我活”；而后者多用于谴责坏人之间的内斗，道德贬斥色彩更强。因此，dog-eat-dog competition 宜译为“残酷竞争”或者“弱肉强食的竞争”，而非直译为“狗咬狗的竞争”。只有当语境本身强调双方都是卑鄙之人、彼此内斗时，“狗咬狗”才可能成为合适译法。

Table 2. A comparative table of semantic conversion and translation strategies for Chinese idioms about the animal “dog”  
表 2. 汉语动物词“狗”习语的语义转换与翻译策略对照表

| 汉语表达    | 文化含义      | 推荐译法                                                                    | 翻译策略    |
|---------|-----------|-------------------------------------------------------------------------|---------|
| 狗仗人势    | 依仗靠山欺压他人  | bully others by relying on a powerful backer                            | 意译      |
| 狗急跳墙    | 走投无路时铤而走险 | desperation drives one to extremes/a cornered dog will leap over a wall | 意译或直译加释 |
| 狼心狗肺    | 狠毒、忘恩负义   | heartless and ungrateful                                                | 意译      |
| 狗嘴吐不出象牙 | 坏人说不出好话   | nothing decent can come from a foul mouth                               | 功能对等    |
| 犬马之劳    | 自谦地表示愿意效劳 | humble service                                                          | 文体转译    |
| 狡兔死，走狗烹 | 功臣被利用后遭抛弃 | when the cunning hare is dead, the hound is boiled                      | 保留典故并加释 |

汉语中含“狗”的成语和俗语则多带有贬抑、斥骂或自谦色彩, 英译时也不宜逐字硬译。例如上表 2 中“狗仗人势”若译为 a dog relies on its master's power, 虽然保留了形象, 但英语读者未必能立即理解其讽刺意义。一般语境下可译为 bully others by relying on a powerful backer; 如果是在民俗、文学或文化介绍文本中, 则可采取“直译 + 解释”的增译法, 如 like a dog threatening others under its master's protection, meaning to bully people by relying on someone powerful。

由此可以看出, 习语层的主要风险不是词义空缺, 而是“伪对应”。当英汉表达看似都有“狗”, 但情感预设相反时, 需要采用框架替换或意译; 当二者情感倾向相近但语义侧重不同时, 则需要微调补义, 而不是逐字直译。

### 3.2. 文学名著中的“狗/Dog”: 意象保留与文体调节

文学文本中的“狗/dog”常承担象征、讽刺或人物塑造的功能。因此, 文学翻译不能仅以“通顺”为唯一目标, 还要考虑文化内涵和文体风格。

鲁迅在《狂人日记》开篇写道: “今天全没月光, 我很不大好。白天赵家的狗又看我两眼, 因此甚以为疑……”, 杨宪益与戴乃迭(Yang Xianyi & Gladys Yang)在经典英译本中译为: “The Zhao family dog looked at me with a suspicious eye.” 此处译者果断采用异化直译法保留“赵家的狗”这一实体意象。在鲁迅的笔下, “赵家的狗”不仅是一只动物, 更是封建宗法宗族统治与礼教秩序的具象化窥探者。英语读者虽缺乏汉语中“狗”与封建爪牙的深层联想, 但在压抑的上下文语境压制下, 完全能借由“带有怀疑眼神的狗”感受到封建社会令人窒息的监视与敌意。若译者擅自将其意译为“The Zhao family's servant”, 将彻底摧毁鲁迅先生冷峻肃杀的现代主义象征张力。

在莎士比亚名剧《威尼斯商人》(The Merchant of Venice)中, 犹太商人夏洛克控诉安东尼奥对其进行人身侮辱时反复提及: “You call me misbeliever, cut-throat dog, /And spit upon my Jewish gaberdine.” 此处的“cut-throat dog”凝聚了欧洲中世纪以来强烈的反犹宗教偏见与人格侮辱。朱生豪先生将其精准译为: “你骂我是异教徒、杀人的恶狗, 把唾沫吐在我的犹太长袍上。” 汉语中的“恶狗”与源语中的贬抑色彩实现完美契合, 使得戏剧冲突的张力与夏洛克内心的屈辱愤怒在目的语舞台上得以淋漓尽致地再现[11]。相反, 在老舍先生的《骆驼祥子》中, 描写祥子在黑暗社会中被宪兵、特务与车厂主层层盘剥压榨时, 多次发出“像条狗似的活着”的感叹。英译时若仅译为“live like a dog”, 英语读者可能会产生歧义(联想到现代西方宠物狗的养尊处优); 译者施晓菁(Lynne Giles)等将其处理为: “living like a beaten stray dog/treated no better than a cur”通过增补“beaten”(被毒打的)与“stray”(流浪的), 精准激发了英语读者对于无家可归、备受凌辱之弱小生灵的同理心, 达成了文学深层情感的功能对等。

因此, 文学翻译中的关键并不是简单判断“狗”褒义还是贬义, 而是判断它在文本中承担何种功能: 若是情节实体, 应准确指称; 若是象征意象, 应尽量保留; 若是固定辱骂, 应匹配语气; 若是文化典故, 则宜直译加释。

### 3.3. 影视字幕中的“狗/Dog”: 即时理解、口语化与节奏感

影视字幕案例的选择遵循“中英方向互补”原则: 《大话西游》考察中译英时如何在目标语缺少相应贬义框架的情况下进行语义补偿; 《华尔街》则考察英译中时如何避免“dog-eat-dog”与“狗咬狗”之间的部分错位导致误读。

当源语的“狗”承载深层文化隐喻且处于影片情感高潮时, 直译往往导致目的语观众情感共鸣的断裂。以香港电影《大话西游》结尾台词“他好像一条狗啊”为例。其官方字幕译为“He looks like a dog”。从认知框架看, 这是典型的“完全错位”: 汉语语境中该台词蕴含着对失去自由、卑微凄惨的复杂感慨,

而英语中“dog”缺乏此预设,甚至可能被理解为“滑稽的家伙”。在无空间加注的情况下,可行的策略是“意译性增补”,如译为“He looks like a stray dog”或“He looks like a lost dog”,借助“stray”和“lost”传递出无家可归的意味,引导英语观众向“悲凉”方向联想。类似策略也见于美剧《权力的游戏》中“dog”相关辱骂语的汉译,译者常根据语境增补“野狗”“恶犬”等修饰词以强化贬义。

当“dog”以习语形式出现且侧重语用功能时,归化替换是字幕翻译的首选。电影《华尔街》中有一句经典台词:“It’s a dog-eat-dog world out there.”汉语字幕通常译为“这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或者“这是一个你死我活的世界”。这属于“部分错位”的处理,这种译法放弃了狗的形象,直接使用汉语惯用表达,保证了观众在极短时间内理解角色对竞争残酷性的感叹。若直译为“这是个狗吃狗的世界”,汉语观众不仅会感到奇怪,甚至可能误以为是在说“狗咬狗”的混乱内斗(“dog eat dog”更多指无情的竞争,与“狗咬狗”的讽刺含义有差异)。因此,归化在此不仅是效率问题,更是准确性要求。

### 3.4. 新闻社评中的“Dog”: 术语化隐喻与立场控制

在严肃的新闻报道、国际关系评论与社论政治文本中“狗/dog”相关词汇往往已经术语化。此类翻译的首要任务是信息准确,其次才是修辞形象的保留。

“Watchdog”的去侮辱化转译: Watchdog 是新闻英语中极常见的词,可指监管机构、监察组织或监督性媒体。例如 financial watchdog 通常应译为“金融监管机构”, media watchdog 可译为“媒体监督机构”或“传媒监察组织”。如果直译为“金融看门狗”“媒体看门狗”,在汉语中容易产生“替权力看门”“奴性服从”的负面联想,偏离英语中“监督公共权力或行业行为”的积极含义。

“Lapdog”与“Attack dog”的修辞匹配: lapdog 本身就带有依附、顺从、讨好的贬义,与汉语“哈巴狗”较为接近。例如社评中说某政客是 a lapdog of big business,可译为“某大企业的哈巴狗”或“某大企业的附庸”。而 Attack dog 在政治报道中常指负责猛烈攻击对手的人,可译为“打手”或“先锋”。若译为“攻击犬”,则容易被误解为真实动物。

汉语新闻评论中的“狗”相关表达英译时同样需要谨慎。例如“走狗”“狗腿子”在政治修辞中可译为 running dog、lackey 或 proxy。其中 running dog 能保留汉语政治话语的斗争色彩,但在当代英语中带有较强的意识形态意味;如果译文面向普通新闻读者, lackey 或 henchman 往往更自然。“狗急跳墙”在社评标题中常用于形容对方陷入困境后的冒险行为,英译时一般可译为 a desperate last-ditch move 或 act out of desperation,而不必保留“dog”。

### 3.5. 网络流行语中的“狗”: 从“单身狗”到 Simp 的文化再造

近十余年来,汉语网络中的“狗”逐渐从传统贬义系统中分化出新的自嘲和萌化的功能。“单身狗”“加班狗”“考研狗”“累成狗”等表达,不再单纯表示侮辱,而是通过自降身份来制造幽默、缓解压力,并形成群体认同。这类表达英译的关键在于识别其深层的情感含义,摆脱字面束缚,利用英语本土的网络亚文化进行“语用对等”重构与文化再造[12]。

在网络用语翻译中,“舔狗”与现代英语俚语 simp 的对应最具代表性。二者都含有“在情感关系中卑微讨好、失去自尊”的含义,因此在多数网络语境下,“舔狗”可译为 simp,“别当舔狗”可译为 Don’t be a simp。但如果“舔狗”用于权力关系或职场关系,simp 就不合适,应改译为 bootlicker、toady 或 sycophant。这说明网络词汇的翻译要根据语境判断:是恋爱关系、职场权力关系,还是政治依附关系。

与此同时,英语中的 dog 文化也在反向影响汉语网络表达。例如 doggo、good boy、doge 等英语网络文化进入中文后,催生了“狗狗”“狗头”“doge 表情”“狗头保命”等表达,使“狗”进一步脱离传统贬义,向萌化、戏谑化和表情包化方向发展。在字幕和网络翻译中,如果目标受众熟悉这种网络文化,

可以适当保留“doge”“狗头”等表达；如果面向普通读者，则应转译为“开玩笑地说”等表达。  
由此可见，网络语翻译应根据受众文化背景、平台语体和幽默效果进行再创造，而不是机械保留“狗”。

3.6. 翻译策略选择的综合原则

综合上述不同文本类型的分析，结合英汉“狗/dog”的认知框架错位类型，我们可以提炼出针对该类文化负载动物词的“框架错位适配翻译模型”，这一模型是针对“狗/dog”这类存在系统性跨文化认知错位、且伴随语义历时演变的动物词汇量身提炼的，具体操作逻辑如下表 3 所示。

Table 3. A mismatched-fit adaptation model for the translation of “dog”  
表 3. “狗/dog”翻译的框架错位适配模型

| 错位类型   | 适用场景                                               | 操作策略                                              | 典型案例                                                                      |
|--------|----------------------------------------------------|---------------------------------------------------|---------------------------------------------------------------------------|
| 完全框架错位 | 源语与目的语情感预设完全相反(如英语褒义 dog 隐喻、汉语贬义狗隐喻)               | 框架替换(以目标语惯用表达替换); 或框架移植 + 语境补偿(直译但增加修饰语、注释或上下文提示) | a lucky dog 不直译为“幸运狗”，重构为“幸运儿”；“走狗”普通语境下重构为 lackey(帮凶)，符合英语贬义框架           |
| 部分框架错位 | 情感倾向一致，但语义侧重点不同(如英语 dog-eat-dog 和汉语“狗咬狗”)          | 微调补义：保留意象不引发误解就补修饰明确语义；差异过大直接意译调整侧重               | dog-eat-dog competition 不译为“狗咬狗的竞争”，调整译为“残酷的竞争”；若需保留意象可补义为“像狗一样互相撕咬的残酷竞争” |
| 新兴框架错位 | 源语产生传统外的新语义，目的语无对应预设(如汉语网络自嘲“单身狗”、英语宠物文化 fur baby) | 文化适配再造：借用目标语中功能相似的俚语、网络词或自创新表达                    | 汉语“舔狗”匹配英语已有俚语 simp，实现语用对等；英语 fur baby 再造为汉语“毛孩子”，适配汉语宠物文化新语境             |

该模型的核心启示是：“狗/dog”翻译的本质不是简单的动物名称转换，而是文化认知框架的跨文化适配。译者只有先判断源语“狗/dog”所属的认知框架类型，再对比目的语的框架错位程度，结合文本类型的交际需求选择对应策略，才能避免误译，实现跨文化交际的语用等效。

4. 结语

本文从文化语义与翻译策略两个维度考察了中英动物词“狗/dog”的差异。研究发现，汉语传统文化中“狗”以贬抑性隐喻为主，指向卑劣、谄媚与依附；英语中“dog”则多含褒义或中性联想，突出忠诚、陪伴与勤勉。这一差异根源于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传统及文学想象的不同，并在当代网络语境中发生新的重构，表现为汉语“狗”类词的去贬义化与自嘲化。这一“同物异义”现象的深层根源，是两种语言在不同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宗教伦理与文学传统中形成了不同的认知框架。

翻译不仅是词语的符号转换，更是不同文化认知框架的跨语言适配。为使翻译策略的讨论超越零散的技巧罗列，本文引入“框架错位”概念，将“狗/dog”在跨语言转换中的认知冲突归纳为完全错位、部分错位和新兴错位三类，并据此提出“框架错位适配模型”。该模型主张：翻译策略的选择应首先识别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错位类型。完全错位应优先采用框架替换，或以“直译 + 语境补偿”的方式实现框架移植；部分错位宜在保留形象与调整语义侧重之间进行框架调适；新兴错位则需借助目标语中功能相近的表达加以框架再造。同时，文本类型作为重要语用条件对模型操作形成约束：习语谚语侧重功能对等，文学文本强调意象保留与文体调节，影视字幕偏向即时可解的归化处理，新闻评述须兼顾信息准确

与立场控制, 网络流行语则可进行创造性转译。由此, “狗/dog”的翻译不再是孤立的逐例判断, 而成为有据可循的跨文化框架协调机制。

本研究采取的是定性典型性案例分析方法, 重在构建“框架错位适配模型”, 故没有对英汉“狗/dog”的全部语料进行穷尽性计量。未来研究可依托大型语料库, 系统检索汉语“狗”与英语“dog”的常见搭配和隐喻表达, 对比各译法在真实翻译语料中的分布频率, 从而对本模型作进一步的量化验证与修正。

## 基金项目

青海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 中英文化差异在中英动物词谚语中的体现及译法(项目编号: qhnxskj2026064)。

## 参考文献

- [1] Lakoff, G. and Johnson, M.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2] 张玮. 基于语料库英汉“狗”的概念隐喻[J]. 西安外国语大学学报, 2017, 25(2): 11-14.
- [3] 冯颖. 从社会语言学角度看“XX 狗”式词语[J]. 汉字文化, 2022(S1): 34-36.
- [4] 李思爱. 网络用语中动物隐喻的跨文化对比——以“猫”与“狗”为例[J]. 中原文学, 2025(12): 138-140.
- [5] 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词典编辑室. 现代汉语词典[M]. 第7版.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 [6] 许慎. 说文解字[M]. 北京: 中华书局, 2013.
- [7] 刘祥宇. 汉英动物词“狗”的隐喻对比及其跨文化交际策略[J]. 新楚文化, 2026(17): 70-72.
- [8] 奚嘉豪. 浅析英汉动物词“狗”的隐喻对比[J]. 名家名作, 2022(11): 108-110.
- [9] Nida, E.A. (1964) *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E. J. Brill. <https://doi.org/10.1163/9789004495746>
- [10] Venuti, L. (1995)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 A History of Translation*. Routledge.
- [11] 刘宁宁. 从概念隐喻映射的角度看英汉动物隐喻习语[J]. 汉字文化, 2022(16): 155-157.
- [12] 李怡. 网络热词“狗”在不同情境下的词类分析[J]. 汉字文化, 2023(10): 148-150.